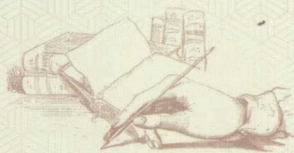


# 叶君健全集

第十六卷 散文卷(一)



清华大学出版社

# 叶君健全集

（全十卷）



叶君健全集

---

# 叶君健全集

---

第十六卷 散文卷(一)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 第十六卷出版说明

本卷为散文第一卷,收记人、记事的作品共九十二篇(传记类部分不入此卷)。

全卷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国内的人事记述,下编为国外的人事记述。

上编内的安排顺序取“类聚”原则,下编内的安排则按各洲的国家和地区,以英文字母为顺序,为能便于阅读和查检。

## 目 录

## 上 编

激动	
——略记“艾培”与宋庆龄·····	3
我的主编茅盾·····	7
我和茅盾的绵绵情谊始自香港·····	11
见故人	
——近会巴金·····	15
长者阳翰笙·····	18
和翰老相处的日子·····	21
归国途中遇老舍·····	24
他祈求安定与太平	
——忆老舍·····	28
一个读书人的选择	
——记沈从文·····	36
一位憨直的朋友	
——忆胡风·····	41
老人	
——记许觉民·····	44
一席话旧	
——记吴组缃·····	46
“无情”背后的热情	
——追念曹靖华·····	50
陈西滢和凌叔华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页·····	52
忆蒋彝·····	61
申文江教授·····	70

王淑媛大夫 .....	74
我的牙医生 .....	76
一位坐堂郎中 .....	78
平凡而伟大的医务工作者 .....	81
老教授的理想和实践 .....	83
我们的老师 .....	88
胡同里的邻居们 .....	90
美人 .....	99
老四 .....	101
不知名的老相识 .....	104
春兰的母亲 .....	106
一个中学生 .....	109
小妞 .....	112
母亲 .....	115
永远的怀念 .....	120
老伴 .....	124
遗憾 .....	128
佼志 .....	133
爷爷带我去捞鱼	
——小孙子讲的故事 .....	140
亲人 .....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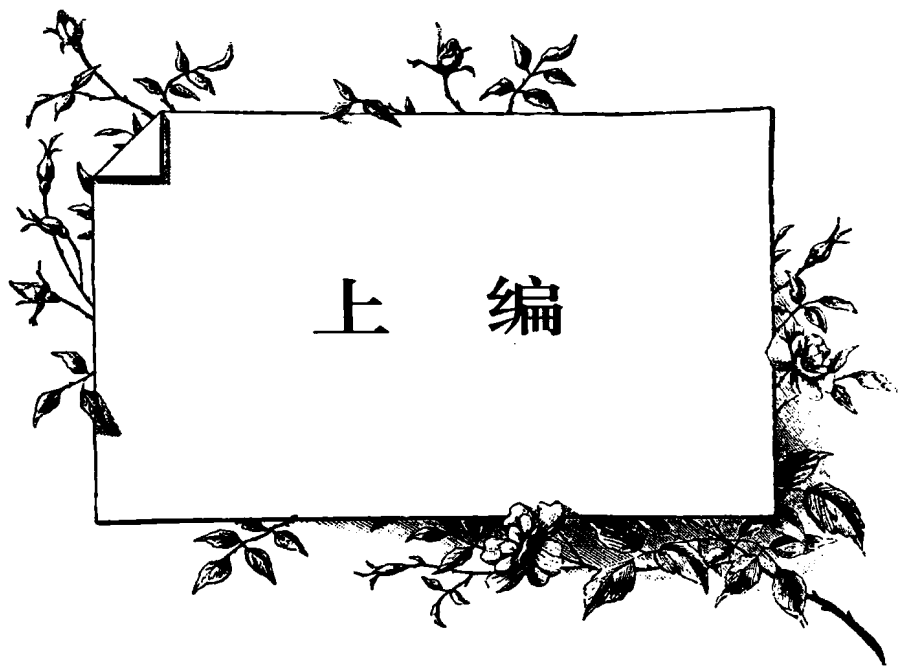
## 下 编

与斯沫特莱的一段交往 .....	147
珈伦——美国笔会的灵魂 .....	155
大使 .....	164
今年的贺年片 .....	167
附：阿瑟·米勒的来信 .....	170
一位美国女友 .....	172
新结识的一个美国女大学生 .....	177
空中女服务员 .....	185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巴 .....	191

会见帕特里克·怀特 .....	193
附：新年祝词 .....	197
艺术的重任	
——读帕特里克·怀特的来信 .....	198
飞来的噩耗 .....	200
欧文·拉铁摩尔 .....	204
不同行的校友 .....	212
普利斯特莱一家 .....	215
旧友 .....	237
中国是她感情寄托的所在	
——记著名英籍作家韩素音 .....	240
他乡遇故知	
——与国际笔会朋友的会见 .....	245
新结识的一位保加利亚女诗人 .....	251
丽莉安娜·斯德番诺娃 .....	257
“我死时要面向太阳” .....	261
自由、个人、生活、创作	
——由此而联想起两位西方女作家 .....	265
一个童话作家的“爱情”故事 .....	271
安娜·西格斯 .....	275
斯拉娃·珈特纳尔 .....	277
尤利·巴基 .....	284
记一位冰岛作家 .....	288
远方来信	
——想起霍尔杜尔·拉克斯纳斯 .....	291
两张合影 .....	295
一个来不及见到的作家 .....	297
一次意外的探视 .....	300
日本的旧交 .....	304
旧交 .....	308
为一个朴素事业而献身的人	
——记三宅史平 .....	311
记绿川英子 .....	314

绿川英子——作家和朋友	321
干杯	324
老朋友	326
小林信三郎	331
卖“中华面条”的人	335
记路易·艾黎	339
和埃格纳的会见	358
我的挪威女友	368
我和爱泼斯坦	374
未来的建筑师	383
保卫文化与和平	
——在波兰遇见的作家们	388
又接上了和柴门霍夫一家的友谊	401
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亲属	408
爱罗先珂：一颗彗星般的盲诗人	411
一个被遗忘了的诗人：爱罗先珂	415
西班牙的诗人洛尔迦	421
“乌托邦”的追求者	424
“老游击队员”及其他	430
一周间	
——和南斯拉夫世界语者在一起	442
一对出租汽车司机	450





上 编



# 激动<sup>①</sup>

——略记“艾培”与宋庆龄

“激动”这个词也可以理解为冲动，如果这种冲动在言行上表现出来，它就是一个具有贬义内涵的词了。但另一方面，它也可形容某种振奋人心的情境所引发出的一阵欢欣。近时，我在一个鲜为人知的单元房里“养病”，地方难找，也无电话，生活安静有余，但却是单调过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本很厚的英文书。它的印刷装帧非常精美，近七百页，书名是《世界历史中的女性宋庆龄》(*Women in World History Soong Ching Ling*)。我禁不住立时就激动起来。书的封里扉页上作者亲笔写了这样两行字：

给老朋友老叶，请提意见。我以热情和最好的祝愿，希望你完全康复。

艾培

“艾培”就是爱泼斯坦的昵称，在朋友中间使用。我们可称是不折不扣的“老朋友”了。我们相识于一九三八年初。我当时在武汉政治部第三厅做对外宣传工作。那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我们有些英文翻译上的问题需要相互咨询或交换意见，因此经常见面。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对中国政局的发展、中国的抗日和中国本身的前途发生了兴趣，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研究中国问题及中国革命。武汉沦陷的前夕，我们几乎是同时撤离到广州；广州失守后，我们又几乎是同时转到香港。在那里，共同的兴趣和工作又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在香港被日本法西斯军队占领前的一段时间，我们还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真是所谓“朝夕相处”。后来我们又先后辗转来到重庆，也是经常见面，直到一九四四年我去英国。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sup>①</sup> 文中引文是摘自爱泼斯坦写的这部传记的中文译本(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为沈苏儒，他在外文局长期与爱泼斯坦共事。

后他赴美国。在赴美途中，他路经英国，我们又在伦敦相互见面。一九五一年宋庆龄邀请他回到中国，协助创办对外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我那时也在同一个单位——即现在的外文局——编辑一个英文刊物《中国文学》，我们又成为了“同事”。宋庆龄去世后，他不只一次对我说过，他要写一部她的传记。现在“老朋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手捧这部书，如何不激动！

宋庆龄生于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去世。她漫长的一生绵延了几乎整个世纪。对中国说来，这是一个多灾多难，但也充满了英雄业绩的世纪。大清封建王朝的崩溃、民国的建立；革命基地广州的危机——即陈炯明的叛变；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北伐战争以及接着出现的武汉革命政府；蒋介石对革命的出卖以及接着他所展开的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和遍及全国的白色恐怖；日本法西斯军队的入侵以及广大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所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标志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外国势力支持下所掀起的内战；中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突飞猛进以及接着“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文革”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开展以及与之同步进行的全面对外开放，等等——这些组成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错综复杂、动人心魄的事件，宋庆龄不仅都参与过，而且发挥了积极的、激励民心的深远影响。她一生事业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在世界上恢复中国人民的尊严，树立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形象。她是一个具有无私博大奉献精神、诚实的、完美的人格的人。

她的感召力遍及全世界。许多伟大的革命者、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公正的政治家——也包括军人，无不对她怀有崇敬之情。这种崇敬也不单源于她伟大的人格，主要还是来自亲身与她实际接触的体会。国际上许多重大事件中也都隐现着她的身影和她的人格影响。她在美国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同时也具有中国优良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修养。她是具有双重文化——西方和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国际正义事业与世界和平的促进中，她一直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与她接触过的人士，无不受她伟大人格的感染。世界上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化人物，如尼赫鲁、斯蒂威尔、罗曼·罗兰和埃德加·斯诺等，无不对她表示景仰，为她的高尚品格所感召。

她在邪恶面前是个不屈不挠的英勇战士。在蒋介石推行的白色恐怖期间，她救援过大量的革命者，也救援过国际进步人士，如“泛太平洋产业同

盟”秘书处的代表牛兰夫妇；她为救国会的“七君子”伸张正义，发表了言辞犀利、气势磅礴的申明，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诬蔑；她领导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随后又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她把中国人民的抗日和争取民权的斗争与当时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运动联系在一起，广泛地团结了国内和国际的具有正义感的人士，把中国的抗战和民权要求与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联系在一起，造成国际性的、群众性的反侵略浩大声势。她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者。

她原是祖籍海南的“客家人”，出身于一个韩姓的贫苦农民家庭，靠在几块沙土地上种椰子为生。为了摆脱贫困的命运，她的父亲九岁时就去爪哇投靠一个亲戚，在那里当学徒。那个亲戚有一个姓宋的堂舅，没有子嗣，就收养了他，让他改姓宋，名耀如。这位养父在美国波士顿开了一家出售中国丝绸和茶叶的铺子，宋耀如就去了美国。一个虔诚的美国基督徒劝说他入了基督教，不久他进了威尔明顿的杜克大学攻神学。毕业后他被教会派回上海当牧师。他每月的薪水只有十五美元，不足养家，于是他便开了一个印刷厂。这个厂印宗教的文件，也接受印革命宣传品的活儿，这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无意中发生了联系。宋庆龄后来与孙中山认识，以致结婚也并不偶然。她在上海教会办的“中西女塾”完成她的中学教育，不久就去美国学习。她回国后，从一九一四年九月开始就与孙中山在一起工作，当他的英文秘书。一九一五年十月她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从这时起她与她的姐妹兄弟们都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这些亲属后来都成为了蒋介石政权里的要员，而她则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与中国人民共命运，同呼吸。正如毛泽东说过的，她是“宋氏家族窠里飞出来的一只凤凰”。

可以想象，要写一部传记，如实地再现这样一个二十世纪伟大女性的形象，绝非易事。单凭有关她的材料和她的一生活动的历史记载是远远不够的。引用爱泼斯坦的话：“她是一个人品既完美又独特的女性。凡是见到过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给予的温暖。她给人的鼓舞力量是不分中外、无边无界的……”这种品格只有最理解她的人才能在她的传记中表达出来。宋庆龄本人也知道这一点。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她在给爱泼斯坦的信中说：“很多出版社的负责人和作家来同我联系，有的还派代表到这里来找我，劝我让他们来写我的传记……我只信任艾培来做这件事，因为你比别人更了解我。”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她又提起这件事：“我想请你在你死后写我

的传记——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在艾培向她保证不负重托时，她于一九八〇年三月十五日回信说：“我终于可以对你这样说了——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已经同意承担为我写传记的事，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所有的传记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在世界许多著名的传记中，作者与作品的主人公在思想和感情上能有如此深切的交流和理解，是不常见的。

艾培是宋庆龄的忠诚的景慕者，同时又是她的朋友、同志和同事。再引用艾培自己的话说：“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这两段时间里，我经常——有时是每天——看到她，同她一道工作。”在头一段的时间里，我也在香港，与艾培住在一起。他事实上不仅是“每天”，也包括每晚，为宋庆龄——也是在为中国——工作。他白天在一个英文报纸为了生活而当编辑，晚间则全花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中国保卫同盟”的狭小办公室里——我每晚听见他开门回来时总是半夜过后。那里只有两个工作人员——廖梦醒和柳无垢，对外的外文工作则全由他负责。他们的工作空间虽小，但他们所面向的却是全世界。宋庆龄也住得离我们不远。她虽然不来办公室，但她是整个“同盟”工作的神经中枢，艾培几乎每天要抽出时间去向她请示。那时大家的生活严谨，工作紧张，但气氛却是非常愉快。我们的屋子有个阳台，可以俯瞰香港的海面。廖梦醒和柳无垢在需要轻松一下的时候，就到我们这里来，说说笑笑，面对海上广阔天空，似乎隐约地看见新中国的形象就在那云间出现。

现在新中国果然就在我们这个坚实的地球上巍然屹立起来了。艾培也成为新中国的公民，并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参与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工作。于今我们都已年过古稀——而宋庆龄本人及廖梦醒和柳无垢也早已作古，但我们还有幸活着，并还在为这个新中国而工作。回想当年，我不免忽然产生了年轻之感——因为我们现在正活在这个中国是那么生气勃勃，显得非常年轻。艾培为当时大家所景仰的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用极为亲切和热情的语言写出的传记，在这个时刻出版，我翻开每一章，看到里面许多生动照片的插页，心潮之澎湃，即使用“激动”这两个字也似乎不足以形容。这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

（作于一九九三年，选自《树上的小鸟》，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月）

## 我的主编茅盾

两个月以前,为了一项国际世界语活动的事,我曾在电话上请茅盾同志帮助,他慨然同意了。比那时更早几个星期他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我,也是有关三十年代一位外国作家在中国从事革命文化活动的事。虽然他的年事已高,但他办事和处理问题仍然是非常认真、仔细和迅速。我常常为他精力充沛和头脑敏捷而钦慕。“四人帮”倒后,我知道他的工作一天比一天忙,找他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所以这几年来我只去看过他一次,问候他的健康状况。我们谈了一些有关他的视力和眼疾问题。以后我就不敢再去干扰他了。我想他的工作压力总有一天会减轻一些,那时我再找机会去看他。他是一位文学修养深厚、生活知识丰富的老前辈,我每次和他交谈总是得到教益不少。但是这个机会现在没有了!我感到无限的怅惘。

我从中学时期起就是他的热心读者。但我认识他还是抗战时期。与他来往比较频繁则是在武汉沦陷,我撤退到香港以后。我也在那里做点文化工作,同时也为外国的文学刊物译些国内抗战的作品。那时的香港不像现在,在文化上可说是相当荒凉。追逐金钱是人们活动的中心,社会上最尊贵的人物和令人景仰的头衔是“经理”。中文当然是那里的通用语言,但却和我们在内地所用的不同。举例来说,在街道上的公共汽车站,你会发现牌子上写的是:“若要停车,乃可在此。”香港有个有名的天主教堂圣母院(Notre Dame),它在当地的中文译名却是“余之夫人堂”。由于战争的关系,内地也有些文化人陆续来到香港,生活书店也设了分店,文化工作可说是逐渐展开了。但那时这项工作的对象基本上就是具有上述文化特点的当地读者。

局面的打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文学这个领域。首先得改变文风,改变风气,改变方向。茅盾同志到香港,是带着一个文学刊物同去的,即《文艺阵地》。这个刊物的出现才算逐渐在这个城市吹来了一点新鲜

的风：它带去了内地的抗战文学作品，包括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带去了内地许多作家的名字和中国新文学的战斗传统。港澳的读者开始了解到什么叫做新文学和文学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文学的空气也开始在香港活跃起来，文学青年也逐渐出现。茅盾同志经常接待他们，指导他们的文学欣赏和创作，于是香港便也有了新文学和作家。这种新局面的出现，影响所及，也扩大到了南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带。那里中国血统的知识青年也受到了感染，而开始了新文学活动。我不敢说茅盾同志在这个地区发动了什么新文学运动。但香港——包括南洋——文学空气能够有今天这样一个比较活跃的面貌，不能说与茅盾同志当初在那里所做的基础工作没有深切的关系。

茅盾同志曾经离开过香港一段时间，后来又回来了。我也曾离开过香港一段时间，去当时被称为孤岛的上海，但不到一年也回来了。我照旧不时去请教他，只有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我才离开香港，来到重庆。茅盾同志据说是在香港失守后才脱险离开的。他也来到了重庆，就住下来了——和王炳南同志住同一幢房子。我也不时去看他，但有一次被国民党的一个特务发现了。他跟踪了我一段路，最后我总算还是摆脱了他，可是从此我就没有再去看茅盾同志了。后来我去英国，就完全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住在英国剑桥，也开始写些有关中国农村的故事。茅盾同志的作品是我当时从事“创作”的一种灵感的源泉。他在他的作品中所坚持的严峻的现实主义，他对中国社会生活的敏锐观察力和分析能力，一直是我学习的标准。他的中、长篇小说现在已被公认为不朽的作品，但我觉得他的短篇也是世界杰出的名篇。特别是那个“微型”三部曲《春蚕》、《秋收》和《残冬》，给我的感受最深。他以极经济的篇幅和极高超的技巧，描绘出作为中国大革命的背景的、由广大农民所构成的中国社会的一个真实的缩影。我曾把它们译成了英文，和其他一些战时短篇小说，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等，放在一起，组成一部中国现代短篇集。这个集子就是以这个“微型”三部曲命名的：《三季》(Three Seasons)，在伦敦出版。外国许多评论家们读了这个“微型”三部曲后也与我有同感，认为它们是世界杰出的短篇小说。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小三部曲，人们可以懂得蒋介石政权为什么一定要崩溃，中国的革命为什么在农村发展得那么快，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广大的农民支持。这个小三部曲当时在



国外无形中起了形象化地解释以农村为根据地的中国革命的作用。

解放以后，我编以外国读者为对象的一个英文刊物《中国文学》。从一九五三年起，茅盾同志就是这个刊物的主编，我是他的助手，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他的名字被“革命群众”从刊物上拉下来为止。那时我和他接触的机会多了，不仅业务上有些问题得常常向他请示，还有些外事活动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如一九五六年在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和一九五七年在苏联乌兹别克首府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他那时就是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团长。他是一个精通中外古今文学和政治修养很深的人，执行政策总是恰到好处，再加之他为人谦虚和蔼，因而也能广泛地团结来自各国的作家，所以每次会议总是取得预期的效果。作为一个直接在他带领下工作的人，我也从中学习了不少的东西。

多年来作为在他指导下的一个编辑，我当然在文学和编辑业务上学得了更多的东西。但是他给我同样不可忽视的启发，并经常使我感动的一件事，却是他和我的一些业务通信。我不时有些问题得向他请示，他总是很迅速地回答，一般是用书信的方式。我在这里不想谈那些信的内容，因为那牵涉的面广，我想谈的是一个细节。他每次写信从来没有用过公家的信封信纸，也很少用洁白的新信纸。他经常用的是—些应该扔进字纸篓的、看过了的油印品。他就是利用这种废纸反面较干净的篇幅写信，有时信封也是用较厚的废纸糊成的。我每次看到这些废纸上他亲笔写的字迹时，总不免要作许多联想。

这种做法说明了茅盾同志长年所坚持的一种节约的习惯，但这里面同时也蕴含着许多比这意义还要更大的东西。从茅盾同志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他并不是出身一个堪称富裕的家庭，也没有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但他却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和蜚声世界的伟大作家。这完全是靠他个人的勤奋和努力。他一生经历过许多生活上的坎坷、政治上的起伏和思想上的动荡，但他对人生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严肃的态度，对自己要求很高。他的俭朴作风也始终不变，即使后来他当了部长也仍是如此。这种作风表现出中国劳动人民的本色，也显示出常年在动乱中坚持奋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勤劳中国人民的本质和真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他的根是深深地扎在中国人民的中间，与中国人民有血肉的关系。这一点，茅盾同志在快要结束他一生时最后所留下的遗言——写